

再说淮南牛肉汤

刘 全

近日,我去田家庵老北头,在北菜市“清真老街牛肉汤店”喝了一碗老味道。这家店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工作后就多次光顾,店面临街简朴,但人气旺,生意好,在周围很有名气。与老店的朱老板聊了几句,大致得知:此店1970年起步,当时是回民饭店的分店。回民饭店是大集体,为解决就业,由他母亲带三个人开始创业,从一个锅、一条桌、几个凳开启。1979年他下放回来,安排在回民饭店上班;1980年辞职接手母亲的店,至今已有一四十六年了。现在门口的挂的牌子是“朱记,百年老字号,早餐中国网红店”。我理解,“百年老字号”是品牌,彰显历史厚重,方显味道鲜浓;四十六年店史是岁月,它私藏于店主的心,是每天劳动的沉淀,也是每月熬汤的心得,更是每年认识的积累。有关淮南牛肉汤的起源五花八门,各种神说、传说、戏说纷纷扬扬。加之武王墩墓考古发掘,于是有专家推测淮南牛肉汤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楚国暮年。推测只是想象,事实很难判断。追根溯源虽说重要,但事物的发展与创新更为迫切。须知在农耕文明时代,史料上常有记载:牛是祭祀的重要牲畜,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,不能随意杀戮;即使是病牛、残牛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宰杀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淮南牛肉汤应该是工业时代的产物,当然与回民迁入应有极大关联。任何美食的产生,都与生活习惯、当地物产、社会进步密不可分。四十多年的时空中,国家由改革开放阶段已进入新发展阶段,

由解决温饱阶段进入全面小康阶段,由物质匮乏阶段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阶段。由一店的改变到一街的改变,由一店的发展到一城的发展,由一店的进步到一国的进步,亲身经历再从岁月风云变幻到社会稳定发展变化,深感国家发展之快、社会进步之高、文化自信之强。田家庵是淮南市的发源地之一。八十年代的北菜市,是淮南市的繁华之地。记忆中,当年去北菜市“清真老街牛肉汤店”,要从人民医院家属区一个窄巷子向北走,经过东城市场西口,再向北行约300米,经过许多经营批发生意的店面。最有印象的是红风电影院,这应是五十年代的建筑。电影院向北数十米,淮建路与淮河路十字路口,这家店就坐落在西南街口。店不大,临街搭着雨棚,锅立在东面,西边摆了几个长条桌,供食客所用。也可能因为忙,店主打扫不及时,也可能因卫生意识有待提高,也可能因喝牛肉汤的食客多,脚下常见垃圾。淮南牛肉汤香、辣、鲜是它的特征;香味入鼻,沿街就能闻到;辣度可调节,根据个人口味不同,轻重适度者舒心。辣椒油裹着香菜,喝上一口浓浓的热汤,鲜味直入心胸,品出生活的快乐,悦出心里的快乐,赏出人生的快感。在淮南喝碗牛肉汤既是生存需要,也是生活需求;不光是为了满足求食之欲,也是为了满足精神之欲。八十年代店面的雨棚是街道的风景,拥挤的街面涌动的人,构成了经济春暖的现实。现在看,整齐的店面,整洁的环境,穿梭的

秩序,还有过硬的食材、浓浓的沸汤——原来最动人的风景,是眼前穿梭而过的陌生人遇上热汤温暖了的今朝;是看似平常的现实却显得异常幸福的现在;是历史岁月的过往隐藏着时代进步的征程。文明因岁月而厚重,文化因传承而深沉。一个店的变身是岁月的积累,一条街的变化是时代的写真,一个城市的变迁是发展的记录。北菜市朱记牛肉汤店的发展过程,见证了淮南市的历程:从繁荣的菜市到繁华的东城市场,从热热闹闹的老田家庵街道到人潮涌动的商贸中心,城市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。据了解,为促进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,成立了市各区各层级各行业的牛肉汤协会、商会等不同组织,引领产业向着更多产量、更高质量、更强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。现在淮南牛肉汤在全国各地有2万多家店,已走出国门,在欧洲、中东等地展现风采。牛肉汤作为一种食品,产生出于自然,进步源于必然,发展理所当然。淮南牛肉汤作为淮南的土产,是淮南人的创造;作为淮南的特产,是淮河水滋养;作为淮南地方文化,是城市发展的品牌。品牌源于品质,好的食材品质注入淮南人的味觉,就立起了闻名世界的名食。为了品牌的发展,立于新时代的我们要用新思想引领发展。一个产品的质量,取决于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的质量;团结才有力量,集聚是产业发展的根本;产业体系是产业链构成的基础,基础稳,强链才有可

能。为促进产业发展需求,出台了《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条例》,以法治方式固化产业要素。淮河两岸是黄牛的主产区,黄牛的品质决定牛肉汤的品味;淮南是大豆的原产地之一,要从源头抓好生产,确保豆制品质量,满足牛肉汤配料供给,让产业体系更富有活力。淮河北岸红薯产量高,品种好,粉丝是牛肉汤的关键配料,决定牛肉汤品质;香菜、葱花能增添牛肉汤的品味,这些物产多是淮南优质的土产。建设好牛肉汤产业基地,政府要积极引领产业方向,同时要指导好、监督好产业发展。企业要主动作为,产业是经济之本,没有产业的支撑,经济就失去发展的基础。产业就是就业,就业就是民生,民生是国家发展之基、社会稳定之石、家庭幸福之源。目前淮南牛肉汤产业,建设了以“谢八”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区,主要建设牛肉汤研发基地,以及中试、检测、包装、冷链仓储等产业链集群,打造西商农商城牛肉汤全要素市场,建设牛肉汤快递物流集散中心。以牛肉汤全产业链加工企业为主的八公山区牛肉汤产业园已有规模,以电商运营、孵化、培训为主的田家庵牛肉汤产业园已有效益,以牛肉汤旅游体验、牛肉汤文化保护传承为主的毛集牛肉汤文化融合产业园已有效果。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,打造产业集聚高效平台,推进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区化、集群化、集约化、体系化发展,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期待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得更大更强,为造福淮南人民作出更大贡献。

楚文化大家谈 (第四季) 征文

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

淮南向北百公里外的蒙城,是庄子的故里。这在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就有记载:“庄子者,蒙人也,名周。”两千

多年来,庄子的国籍已成既定事实:宋国蒙人,生于宋,长于宋,是中原文化孕育出的道家宗师。但随着对楚文化研究的深入,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一个颠覆性结论:庄子的根在楚国,他本是楚国贵族,因家国剧变流亡宋国,终其一生都带着楚人的文化基因与故国情怀。

一、《史记》的留白:一个被刻意模糊的国籍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为庄子立传,开篇仅用“庄子者,蒙人也,名周”七个字交代其身份,这与他记载老子时“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”的明确表述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要知道,《史记》为物立传时,标注国别是基本惯例,老子明确为楚人,孔子为鲁人,孟子为邹人,唯有庄子,只提地名“蒙”,不涉国别。这绝非司马迁的疏忽,恰恰是其史学严谨性的体现。“蒙”并非诸侯国,只是战国时期的一处城邑,其归属本就存在争议:一说为宋国蒙邑,一说为楚国蒙地。司马迁没有确凿证据标注庄子的国籍,便选择只记录其定居地,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题。而正是这个留白,让我们得以跳出“宋国蒙人”的固有认知,重新探寻庄子的身世根源。

二、文化基因的共鸣:庄子思想与楚文化的深度契合

判断一个人的文化归属,最直观的证据便是其思想与文风。《庄子》一书,从开篇《逍遥游》中的大鹏展翅,到《齐物论》的庄周梦蝶,处处流淌着楚文化的浪漫与奇幻,与宋国代表的中原文化格格不入。楚文化诞生于江汉流域,与中原礼乐文化截然不同;中原文化重伦理、重秩序、重现实,而楚文化重想象、重自由、重生命。庄子的思想,恰恰是楚文化精神的极致绽放。《逍遥游》中“鹏之徙于南冥也,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宏大意象,绝非中原文化所能孕育——中原文化的审美是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的克制,而楚文化的审美是“乘天地之正,而御六气之辩”的奔放。庄子笔下的鲲鹏、蜩与学鸠、姑射神人,无一不是楚地巫文化中奇幻想象的延续,与出土的楚墓帛画、漆器纹饰中的神鸟、仙人形象一脉相承。更关键的是,庄子的核心思想与屈原的楚辞精神高度同源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与人格的独立;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追求“无待”的逍遥,拒绝世俗权力的束缚,二者的精神内核完全一致。庄子的“齐物”思想,消解了中原文化的等级秩序,与楚文化“信巫鬼,重淫祀”的平等意识不谋而合;庄子对生命的尊重、对自然的敬畏,更是楚文化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直接体现。此外,《庄子》中大量出现的楚地风物、楚地习俗,也印证了其楚人的身份。书中提到的“南冥”“北冥”,“南”正是楚国的方向;“图南”的大鹏,更是庄子对故国的深切思念——“背负青天而莫之天阕者,而后乃今将图南”,大鹏展翅南飞,飞向的正是楚国的故土,是流亡者对家乡最深情的遥望。

三、历史的伏笔:吴起变法与楚国贵族的流亡

文化的契合为庄子的楚人身世提供了思想佐证,而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场重大历史事件,则为庄子的流亡提供了完美的历史逻辑,那就是楚悼王时期的吴起变法。战国初期,楚国国力衰微,楚悼王任用吴起推行变法。吴起变法的核心,便是削弱楚国旧贵族的特权:“废公族疏远者,以抚养战斗之士”,裁汰冗官,收回贵族封地,将资源集中于王权。这场变法极大地增强了楚国的国力,却也彻底触动了旧贵族的核心利益,为吴起埋下了杀身之祸。公元前381年,楚悼王去世,楚国旧贵族发动叛乱,在楚悼王的灵堂之上乱箭射杀吴起。吴起为求自保,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。按照楚国法律,“丽兵于尸户者,尽加重罪,逮三族”,这些贵族的箭矢射中了楚王的尸体,犯下了灭族之罪。楚肃王继位后,下令彻查此事,将参与叛乱的七八十家楚国贵族全部灭族,无数楚国贵族为避祸被迫流亡他乡,这便是庄子家族流亡的历史背景。庄子的家族,大概率是楚国公族,甚至可能是楚庄王的后裔。作为楚国贵族,庄子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这也是他能写出《庄子》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的基础。而吴起变法的灭族之祸,让庄子家族不得不离开楚国,向北流亡,最终定居于宋国的蒙地。这就完美解释了《史记》中“蒙人”的记载:庄子生于楚、长于楚,只是流亡后定居于宋,司马迁便以其定居地标注其身份,而非其国籍。时间线的吻合,更让这一假设无懈可击。楚悼王去世,吴起被杀的时间为公元前381年,而庄子的卒年约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。庄子出生于楚,距离吴起变法的灭族之祸仅十余年,其家族正是在这场浩劫中流亡宋国,庄子便出生于流亡之后的蒙地,却始终保留着楚人的文化基因与故国情怀。

四、故里之争的背后:文化归属的历史印证

关于庄子的故里,两千多年来争议不休,安徽蒙城、河南商丘民权、山东东明争相以“庄子故里”自居。但从文化归属来看,安徽蒙城的说法更具说服力:蒙城地处淮北,战国时期属楚国疆域,是楚文化向中原传播的前沿地带,与庄子的楚人身世完全契合。退一步讲,无论庄子的定居地在何处,其文化归属也已被《庄子》一书定格:他的思想、他的文风、他的精神,无一不是楚文化的结晶。更关键的是,《庄子》一书中对宋人的态度,也印证了庄子并非宋人。书中多次以宋人为嘲讽对象,“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”,将宋人塑造为愚笨、刻板的形象,这绝非一个宋人会对对自己母国的态度。相反,庄子对楚国充满了深情。《庄子·秋水》中记载的“庄子之楚”,用“之”字表示前往,看似与楚人身份矛盾,实则是流亡者对故国的复杂情感:他生于楚,却因流亡而不得以“之楚”表达对故土的回归,这份情感正是流亡者的真实写照。

知道庄子也是楚国人,是因为拜读了韩鹏杰老师的著作《庄子说什么》之后。通过一系列专家专著的研读,我认识到:庄子是楚国人,这一结论不是对历史的颠覆,而是对历史的还原。他本是楚国贵族,因家国剧变流亡宋国,终其一生都在以楚人的视角,书写着楚文化的精神传奇。《史记》的留白,不是对庄子国籍的否定,而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;庄子的“曳尾涂中”,不是宋国隐士的淡泊,而是楚国贵族对权力的蔑视,是楚文化自由精神的极致体现。庄子不是宋国的隐士,而是楚国的灵魂,是楚文化孕育出的最伟大的哲学家。

今天,当我们以楚人的视角重读《庄子》,那些曾经晦涩的文字便有了温度:大鹏的“图南”,是流亡者对故国的思念;庄周的梦蝶,是楚文化奇幻想象的延续;对相位的拒绝,是楚国贵族对权力的不屑。庄子的一生,是楚文化在中原大地的绽放,是流亡者对精神自由的永恒追求。他用一生证明:无论身处何方,文化的基因永远不会改变。庄子,永远都是楚国人。



杜鹏燃春色

徐金陵 摄

“羿射九日”与有穷氏

周 强

当时安丰县治所设在今寿县南部的安丰塘镇。夏王朝建立以后,禹将诸侯进贡的青铜铸成九鼎,象征九州。在以州命名的鼎上,分别铸着各州的山川风物、奇禽异兽。涂山氏所在地域属扬州,扬州诸侯进贡青铜所铸的鼎称“扬州鼎”。禹与涂山氏女生子启,启喝了淮河的乳汁长大,血脉里流淌的是淮河基因。禹崩后,启破坏了禅让制,不仅排斥了禹选定的继承人伯益,还以强硬手段征服了有扈氏等反对势力,继禹之后成为夏朝新的君主,并在都城阳翟(今河南省禹州市)举行重要庆典——钧台之享,郑重宣示:传统的首领禅让制已经结束,王位世袭制已经确立,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长达约4000年的家天下统治。启在位期间,与包括淮夷在内的东夷关系一直友好。启去世后,启子太康继位,并将国都迁至斟鄩,故地可能是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。不久政局动荡,先是太康的五个兄弟之间发生王位之争,接着又有武观在西北地区发动叛乱。太康乐于游猎,不恤民事,曾游猎于洛水之北,十日不

归,使夏王朝在方国部落中的影响大降低。淮夷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乘夏政衰微,人居夏都斟鄩,控制了夏朝实权,成为中原地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。太康被有穷后羿拒于国门之外,流落于阳夏(今河南省太康县),母亲带着五个弟弟待于洛水之滨,怨其不返,乃作《五子之歌》,述之以大禹之戒,并对太康的所作所为进行谴责,史称“太康失国”。太康死后,羿拥立太康之弟仲康为新的夏王,实权仍由羿操纵。仲康死后,羿拥立仲康之子相。相不甘接受羿的控制,于是从斟鄩逃至帝丘(今河南省濮阳市),依附于同姓诸侯,建立了流亡政权。羿一怒之下,自登王位,继续使用“夏”的国号,“因夏民而代夏政”,成为中原地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。有穷氏是一个善射部落,羿上位以后,仗恃其箭术高明,亦沉溺于游猎,又抛弃武罗、伯因、熊髡、龙围等贤臣,宠信来自寒国(今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)的谗臣子弟寒浞。八年后,后羿被寒浞杀害。后羿摄政加即位,实际统治中原地区约30年。寒浞夺位后,追

杀了相,致使夏朝王统中断约40年,史称“羿浞乱夏”。相妻后缙侥幸逃生,生遗腹子少康,随后的夏朝历史就是“少康中兴”。少康与其子杵攻灭了寒浞,又征服了东夷,此后淮夷与夏朝恢复了和平共处。《左传》在回顾羿浞乱夏这段历史时说:“昔有夏之方衰也,后羿自鉏迁于穷石”。关于穷石地望,历史上有争议,其中南宋罗泌《路史·国名纪己》说:“穷”国是“夏世侯伯”之一,“有穷羿邑,楚地。今寿之安丰有穷谷、穷水,即穷石”。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说:“穷”为“春秋楚邑。在今安徽霍邱县南洋河侧”;“穷水”又名安风水,即今洋河。源于今霍丘县西南,流经县西,结流为陂,谓之穷陂。即今城西湖南前身。陂水四分,灌溉农田。出陂后北流注入淮水”。宋代寿州安丰县治所在今寿县安丰塘镇,霍邱县紧邻寿县,有穷国邑虽在霍邱县境内,但其活动范围已经延及寿县西部地带。《汉语成语大全》将“羿射九日”收录其中,并解释说是“形容为民除害的英勇行为”,“也比喻革除弊端,为民谋利”。

土墙草房与柴禾行

高振中

形状的屋梁是隔空互通的。东家的油灯点着了,晃悠悠的灯光,也映照了西家些许光亮。西边家的人“叭叭”地拍蚊子,蚊子可能从屋梁上“偷渡越界”到东边家。一家要喷“敌敌畏”或点蚊香,另一家也一致行动,待到烟雾熏死了蚊子,两家人共同打开门窗驱散满屋弥漫的烟味。两家人借着两家隔空的房梁,从粮票、布票、肉票的柴米油盐,到天南地北地拉家常,感慨“布衣温暖真是福,草舍平安皆是春”。孩子们往往站在床上的被子上面,探出小小的脑袋,看着另一家房间里的活动。直到1970年代中期物质条件改善,西家的儿子又要结婚,屋梁上边那个三角形的隔空才进行了封隔。草房虽然冬暖夏凉,但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漏雨了,下雨的时候就有了另一种风景,外面下大,屋里小下,外面不下,屋里滴答。下雨时家里的洗脸盆、木脚盆、坛坛罐罐都派上了用场,放在屋内地面上接漏下的雨水。漏雨急的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漏雨缓的是“如泣如诉声慢”,加上外面的风雨声,轰隆的雷鸣声,还有青蛙呱呱的叫声,混搭成了我家的“草房交响乐”。奶奶望着大雨点在地上砸出一个个水花,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:“一个雨点一个泡,今年肯定收好稻”。下大雨时,青蛙欢天喜地地在雨中出现了,它是个跳跃的高手,一会儿就

机灵地不见了。而皮肤粗糙、身体臃肿的癞癞猴子(蟾蜍),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,趁着热闹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爬着。我们吓得嗷嗷叫,母亲对我们说:“癞蛤是益虫,吃害虫保护庄稼,还是不错的珍贵中药材。”那时歇后语常用“癞癞猴子趴在脚面上,不咬人也膈应人”,来表示对一种人或事物的厌恶。如今的孩子虽然住在高楼大厦,缺少与自然相处的野趣,也是一种遗憾。草房漏雨严重就要给屋顶铺换新麦草,这是多年一遇的大工程,铺麦草的茅匠(现在没有草房,这个工种也难以寻觅)闪亮登场,把一捆捆的麦草在屋顶铺开,用下面带有钉子的大木板,将麦草压实理顺,使其服服帖帖,多压实几遍,使用的年限就会多一些。地面上父亲和表叔,与屋顶上的茅匠,进行着热情的沟通,一边递递着香烟说:“再抽一支烟打打气。”一边提示着哪儿还要铺平整一些。重要的是还连声说:“工钱该怎么算也要算,中午准备好了酒菜,怎么也要喝几杯、吃两口才能走。”茅匠听说东家备好了酒菜,也不好意思快些收工,在屋顶上下了功夫。我们一边好奇地看着茅匠施展着手艺,一边看着奶奶忙着做晚饭,心里念想的是借机吃些好的解解馋。屋顶茅匠的拍打声、锅里炒菜的滋滋声、孩子们的欢笑声,在金色麦草的屋顶的背景下,连接成一幅幸福美好的画面。事后父亲告诉我,留吃一顿饭,多压几遍草,少漏几年

雨,尊重别人住住也受益于自己。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:“送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”之所以我能够对那时的草房记忆深刻,还来源于田家庵当时盖草房的建材集聚地“柴禾行(háng)”,就在离我家200多米的淮河大坝与淮滨路的连接处。当年的柴禾行,在我幼小的记忆里,就相当于现今的建材大市场。拉车送货的芦苇秆、高粱秆、稻草、麦秸,在坑坑洼洼的路上,沿途颠簸总会撒下一些,在土路上袒露着随风滚动。我就是七八岁在此地开始了劳动的“启蒙”。放学回家,一手递给奶奶缝制的书包,一手接过奶奶交给的篮子,到柴禾行周边,将散落在沿路的麦秸、稻草等拾到篮子里。柴禾行里的人也要颗粒归仓,往往大呼小叫不让给,我就连滚带爬地往家里跑,快到家时又趾高气扬一副凯旋而归的样子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田家庵老北头的民房几乎是草房、瓦房,登上建筑公司高大的楼宇,让我们这些孩子可以“楼高人为峰”,让眼睛饱餐“欲穷千里目”的视野。往北是逶迤磅礴的淮河,由西向东缓缓流动,淮河上的千帆远影,给母亲河添加了无穷的活力。往南望去就是田家庵的主城区,草房与工厂参差错落,灿烂的阳光,将草房屋顶映照得金色辉煌。大自然界的一切,都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生机盎然,生生不息。

典说淮南历史 第一季

“羿射九日”是中国远古四大神话之一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记述了羿射九日的完整故事:“逮至尧之时,十日并出,焦禾稼,杀草木,而民无所食。猥殪、凿齿、九婴、大风、封豨、修蛇皆为民害。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,杀九婴于凶水之上,缴大风于青邱之泽,上射十日,而下杀猥殪,断修蛇于洞庭,擒封豨于桑林。”十个太阳与猥殪、凿齿、九婴、大风、封豨、修蛇等六种凶物共同危害人类,帝尧派羿承担使命,射掉九个太阳,除掉六凶,使人们重新回到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。羿射九日的后续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。羿射九日的故事发生在原始社会,当时的羿还是位神话人物。到了夏代,羿成为东夷有穷氏的部落首领,又成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,他还曾取代夏朝,成为中原地区的实际统治者。有穷氏的国邑就在宋代安丰县境内,

田家庵老北头 趣闻轶事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田家庵,虽然已有新兴城市的规模,但是从淮河南岸到淮滨路的街头巷尾,还残留一些农耕文明的风貌,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一排排参差错落的草房,和草房烟囡里不紧不慢的袅袅炊烟。那时的平民百姓大多都住草房,草房的墙体是土坯,是用黄土拌着铡刀切碎的麦秸草,反反复复用铁锹、抓钩翻拌,甚至用双脚踩在黏糊糊的烂泥中,将僵硬的“土坯”搅拌成黏软的“绕指柔”,然后在木板钉制的模板内摔压压实,做成厚实坚固的土坯砖。草房所需要的其他建材,也是大自然朴实的奉献,隔墙用高粱秆,屋顶用麦秸草,草房的内外墙抹灰,用黄土、石灰与麦秸壳混合搅拌的黏土,这些都是收获农作物的副产品。我们家的草房是1950年从怀远县的老家,搬到淮南田家庵后,与我一个表叔共同建了坐南面北的四间草房,两家各住东西两间。墙体用土坯垒成,房梁用原木搭建,屋顶用麦草铺就。因建房资金捉襟见肘,我们两家之间只是房梁下隔了一道秫秸墙,沿房梁往上三角